

# 克里斯蒂瓦对当今中国文化思考的启发

董 强

2009年2月，茱莉亚·克里斯蒂瓦访华，法国使馆邀请我主持她在北京的法国文化中心题为“一个欧洲女人在中国”的演讲，并担任现场翻译。早在三年前法国使馆就曾经通知我，她将来访，请我预先留出时间，接待她，并为她翻译。结果，由于她个人的原因，未能成行。

这一次，她是带着任务而来的，而且身份是法国“顾问议事会”的议员。这个顾问议事会，被称为“第三议会”，她向我解释，是众议院、参议院之外的第三大立法机构，主要由一些政界人士和各行各业的专家组成，专门为政府提供建议，并起一定的监督作用。我猛然想起自己曾经通过原法国大使高毅的介绍，在北京与法国原教育部长、哲学家吕克·费里见面讨论，他在辞去部长职务之后，好像也去了那里担任议员，一问之下，果然是同一机构，这让我对克里斯蒂瓦的这次来访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。

也就是说，她不是作为著名的知识分子、女性主义专家来华进行学术访问，而是身负公务。法国人在这方面非常讲究，不能利用公务而介入自己的私事。所以，自始至终，克里斯蒂瓦都尽量少谈自己，而将话题集中到“文化多元性”与“世界法语区”上面。因为，她的“公务”，就是来中国考察法语在全世界的教学与使用现状，推广法语文化，推广法国的多元文化政策。

然而，在中国，人们并不完全买这个“公务”的帐。在人们眼中，她是“文本”理论的大师级人物，是“互文性”的始作俑者；她又是继西蒙娜·波伏瓦之后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新代表之一；她还是符号学的主要干将之一。对有些人来说，她更是罗兰·巴特思想的启发者和继承人，等等。所以，所到之处，人们还是围绕着她著作，她的思想，提出问题。可以看出，她对此非常高兴，但总是简明扼要地加以概括性回答，并不时要求人们就她的“公务”提出些问题。

由于是公务，她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并不长。2月24日上午，她先参观了北大校园。中午，北大法语系宴请。下午，她与北大老师与学生座谈。北京一些与法国

社科、文学有关的研究人员、教授也都来到了北大的民主楼，包括社科院的史忠义研究员、首都师范大学的钱翰老师等。首都师范大学的黄晞耘教授也赶来了，他是她的学生，跟随她在巴黎读了博士，最近还翻译了她的新作，《反抗的未来》。北大的一些教师，如孟华、秦海鹰、田庆生、车瑾山、段映虹等人，也都在场。那天不巧，她因为身体原因，嗓子发哑，说不出话来。为了节约时间，她要求大家每个人都问一个问题，然后统一回答。从头到尾，她用最清晰、简练的语言，压着嗓子，回答了所有问题，涉及到互文性，她与罗兰·巴特的关系，文学与电影等问题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也让我对她的演讲充满了信心。

就在此前一天，我收到了她的法语文本。本来是想直接做现场翻译的，因为平常我的所有翻译都是现场进行的，然而克里斯蒂瓦坚持，必须事先将翻译好的文本交给来听演讲的所有人。使馆的人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，您就幸苦了吧。我看到稿子很长，担心自己没有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，就动员研究生帮忙，每人给我先翻译一页的稿子，到晚上八点汇总。原来我以为，自己花上四个小时进行校对、改动，就可以发出去了，先给听众一个基本稿子，现场再做些补充、润色。结果，一看到学生陆续发来的稿子，吓了一跳，基本不可用。原因是克里斯蒂瓦的文字，非常紧凑，涉及面广，融合了各种社科、哲学、文学语言，学生们无法把握。我就一边改、一边重译。等我舒了口气，从电脑前离开时，已经天色大亮。我一看表：早晨八时。为此，我连夜足足工作了十二个小时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等到克里斯蒂瓦开始演讲的时候，我发现，她的要求是正确的。假如我没有这十二个小时的工作，现场翻译她的东西，肯定会有许多纰漏之处。由于稿子很长，第二部分，我要求她进行简要的复述，留出时间来，与大家对话。她就完全脱离了稿子。现场反而变得更加活跃。而在回答问题期间，她更是头脑清晰，回答的内容十分丰富，我一边翻译，一边发出由衷的感叹。最后作为主持人总结的时候，我表达了我由衷的敬意。我认为，这是我很久以来没有听到过的高水平的演讲。它的两个部分，前一部分涉及中国，后一部分涉及西方（而且一半涉及欧洲，一半涉及美国），构成了完美的对称，带有一种真正的文化对话的意味，我将之形容为“宛若一朵饱满的莲花”。

演讲结束后，使馆安排晚宴。法国文化参赞齐格勒先生特意让我坐在她的身边，让我们继续讨论。她非常高兴，对我说了一些溢美之言，但让我高兴的是，

熬夜工作，毕竟没有白费力气，因为她表示希望与我保持联系，有机会的话，“共同合作”，并将她在巴黎的手机号码给了我。我很感动，因为法国人轻易是绝对不会给手机号码的，那证明她是真正想与我继续接触。

5月份，我应刚刚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文化顾问的范曾先生的邀请，赴巴黎为他在联合国的一次演讲做现场翻译。无独有偶，这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主题，也是多元文化。我向克里斯蒂瓦女士发了封邮件，说我会去巴黎几日。她马上给我回信，请我在巴黎著名的啤酒吧“丁香园”与她见面。那是海明威生前最爱去的地方，在《巴黎是一场盛宴》中屡次提到。巴黎的许多名流喜欢在那里接待客人。她的丈夫索莱斯更是那里的常客。据说，在伽利玛出版社工作的索莱斯让会计将所有的工资都直接打在那里，这样，他可以感觉自己永远不用付账……

我按时走进丁香园，没有见到她，就告诉侍者，我与克里斯蒂瓦女士有约。他二话没说，就将我带到一个走廊的尽头。果然，她在那里。与来中国时穿着貂皮大衣相比，她显得简单多了，但还是流露出法国人的讲究。一身典型的巴黎雅致女人的装束。我注意到，她佩戴了一个淡紫色的胸针，而唇膏也用了淡紫色的与它相配。

我们的话题这次很广。她再次表示，访问中国是“公务”，所以不能脱离多元性和法语的话题。我说，您的话题已经非常广泛，又那么的深刻，足够我们消化很长时间的了。我们再次谈到她对中国文化的看法。她说，中国的经济力量，现在没有人可以轻视。但是，在文化上，感觉中国还是没有能够很好地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特征，尤其在近年来。而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是最为相近、最可以进行对话的。美国文化毕竟历史不足，伊斯兰文化相对封闭性比较强，而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最具有开放性，最具有对话的材料和可能性。我深表赞同。

具体来说，我对克里斯蒂瓦的思想的认同，主要在于三个方面。一是她关于“外国人”的思想。一门语言的掌握，就是打开一扇通向一种文化的门。同时掌握许多语言，就是同时拥有多种文化。文化的真正力量，就在于它在自身内部对外来文化的容忍和融化。我们是我们自己文化的外国人，这是她一个著名的说法唯有通过他者文化的迂回，才能更好地理解自身文化的特性与身份。这一点她在演讲中也谈到了。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，包括中印文化的交流，中西文化的撞击

就能明白这个如此简单明了的道理，可惜我国当今无数所谓的“国学”专家们，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

克里斯蒂瓦的第二个令人赞叹之处，是对“民族”这一概念的重新认识。在普世主义与民族“士气低落”的时代，她敏锐地看到，一定的民族意识，是任何国家都需要的，而法国近年来思想界的过度放任，使得民族这一概念遭到了季罗杜所说的“难以察觉的无礼对待”。同时，过度强烈的民族意识，又将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，造成真正的文化倒退。文化多元性的真正意图，就是在防止狭隘民族主义的同时，让民族意识成为一种经济、政治、文化振兴的重要精神力量。这一思想，也对我国当今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。

克里斯蒂瓦在这次演讲中提到的第三大具有启发的思想，是关于两种西方不同“自由”的区分，并对这两种自由的源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。简言之美国式的自由，是一种接纳你进入它的体系之后的机械性自由，而法国式的自由，是一种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“主体的呈现”。在这两种不同自由的区分的反观之下，她对中国思想的理解，就不存在有些人所说的外国人常见的“隔靴搔痒”了。她接受莱布尼茨的说法，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没有“个体”，而是具有一种复杂的、随时因周围环境而改变、关注社会与生存逻辑的本体论认识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对“存在中的人”的重视。我个人觉得，这样的认识，来自一个几十年没有踏上过中国领土的西方知识分子之口，实在让人钦佩不已，让人感到一种纯粹认知的力量。而且，这样的关于“中国经验”的思路，对于中国知识界更好理解自身的文化特性，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。

在我们的交谈过程中，她对自己的书并没有能够在中国及时出版，表示担忧。因为原来说好，她的《中国妇女》中文版三月份就可以出版（所以在演讲中，她提到“下个月”就可以出版）。她甚至请求，我能否帮她看一眼中文的译稿。我看出，她实在不了解中国的出版情况，就安慰她，肯定会很快出来，而且一定会质量很好的。

其实，从我的研究生们翻译她的文字的结果来看，克里斯蒂瓦的作品，是具有相当难度的。我对法国社科理论著作的翻译，近来有了自己的看法。应当说这里涉及到的不是一个翻译的艺术或者技巧问题，而是一个对法国现当代社科思潮的语言是否熟悉的问题。简言之，法国在存在主义思潮之后出现的各种社科

思潮，在精神分析、符号学、现象学的三重“改写”之下，在理解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难度，与以往我们所习惯的文体与语言迥然不同。我国绝大多数的法语翻译工作者，都没有能够有机会接受这一新语言的洗礼。所以，这里涉及的既不是传统所说的法语水平问题，也不是理论上的翻译艺术问题，而是对全新语言的了解与习惯的问题。克里斯蒂瓦女士融会贯通，将现象学、符号学、精神分析学等知识运用得游刃有余，这是她最高明之处，同时，这就增加了巨大的翻译难度，就好比郑板桥的“六分半书”，隶书、楷书参半，再加上兰竹的画笔，让习惯了颜、柳正体的人，不知笔法的走向。衷心希望我的翻译，能够让读者走近克里斯蒂瓦，也希望，已经出版或将要出版的译本，都能将她的思想忠实地传递过来，因为，克里斯蒂瓦确实是名副其实的、法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。